

中華學術論文集



K207/11

中華學術論文集

—— * ——
中華書局
成立七十周年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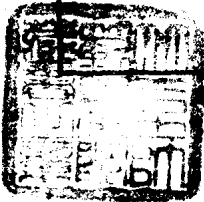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28264

中華書局

1981年·北京



828264

中華學術論文集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20³/₈印張·2插頁·452千字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8,000冊

統一書號: 11018·855 定價: 2.30元

前 言

爲了紀念中華書局成立七十周年，我們邀請學術界的一些同志撰寫論文，編成這部《中華學術論文集》。這是各位作者的研究成果，也是對中華書局的熱心支持。

中華書局作爲整理出版我國古籍和文史哲研究著作的專業出版社，多年以來得到學術界人士的熱情關懷、大力支持，使我們得以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事業中，做出微薄的貢獻。值此紀念中華書局成立七十周年之際，謹向不斷給我們以支持、幫助和指導的同志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現在，我們的祖國已經進入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爲中心任務的偉大歷史新時期，爲了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需要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優良文化傳統，不斷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的學術文化。在這種繼往開來的宏偉事業中，中華書局一定要在黨的領導和學術界同志們的熱心支持下，更好地做好自己的工作，爲社會主義服務，爲人民服務。

我們把這部論文集當作中華書局在成立七十周年的時候，敬獻給學術界和讀者同志們的一點禮物。

中華書局編輯部

目 次

前言

釋中國	于省吾(1)
論“古史辨派”	楊向奎(11)
我對紀傳體的批判與繼承	羅爾綱(37)
釋關於漢代機織技術的兩段重要史料	孫毓棠(45)
東漢末期的大姓名士	唐長孺(71)
法顯和《法顯傳》	章 巽(97)
李嚴興廢和諸葛用人	田餘慶(109)
論梁武帝及其時代	周一良(123)
試論唐代前期布的貨幣職能	王永興(155)
唐五代的紙墨筆硯的製造和改進	王仲華(167)
跋《重建懷聖寺記》	白壽彝(177)
清嘉道年間的士習和經世派	龔書鐸(189)
“拜上帝會”釋論	王慶成(207)
戊戌維新與孔子改制	湯志鈞(229)
跋烏目山僧癸卯詩三首	章開沅(247)

同盟會與光復會關係考實

——兼論同盟會在組織上的特點

.....金冲及 胡繩武(271)

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述略吳承明(303)

近代中國資產階級論略.....林增平(347)

語法修辭之學與語義學之關係郭紹虞(395)

百家爭鳴和先秦諸子的文學成就王季思(411)

屈原與宋玉林庚(427)

韓愈的詩論和詩作季鎮淮(437)

中國古代哲學發展的地區性任繼愈(461)

儒學辯證法論綱龐樸(473)

郭象《莊子注》的哲學體系馮友蘭(525)

《伊川易傳》的理學思想.....邱漢生(597)

近代學者沈善登的哲學思想張岱年(633)

釋 中 國

于 省 吾

中國這個偉大的名稱，既是我們國家自古以來的一個通稱，又是我們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簡稱。中國二字在典籍中有狹義和廣義之別，就狹義言之，《詩·民勞》：“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毛傳：“中國，京師也。”中國也稱國中，《周禮·司士》：“掌國中之士治。”鄭注：“國中，城中也。”至于廣義，是指全中國言之。但是，中國這個名稱起源于什麼時代？為什麼稱為中國？中國有什麼其他名稱？中與國二字本來的形、音、義如何解釋？這幾個問題，都需要進行探索和考證，才能够作出答復，現在分別加以闡發。

一 中國這一名稱起源于什麼時代？

一九六三年，在陝西寶雞縣賈村出土的虢（何）尊銘文：“唯王初邠（遷）宅于成周……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或（國），自之粹民。”王引之《經義述聞》：“其猶將也。”楊樹達《詞詮》：“之，此也。”粹字，典籍多訓為治。銘文的首句，是說成王初遷居于成周。以下又追述武王克商後，在廟廷祭告于天說，余將居此中國，自此治理民政。《書·梓材》：“皇天既付中國民，寧厥疆土于先王。”這是說，皇天

既付與中國人民和其疆土于先王。先王是指武王言之，蓋注誤釋先王為“文武”。其實，在文王時還沒有佔領中原，當然也不會以中國為言。本諸上述，雖然何尊為成王時器，但由於追述武王祭告于天而言及中國；《梓材》雖然也為成王時所作，但由於追述皇天付與人民和疆土于武王而言及中國。以金文和典籍互相驗證，則中國這一名稱起源于武王時期，是可以肯定的。

二 中國稱名的由來以及其他名稱

為什麼稱作中國？這一問題頗為複雜，現在分別詮釋于下：

甲，《說文》：“夏，中國之人也。”段注：“以別于北方狄、東北貉、南方蠻閩、西方羌、西南焦僂、東方夷也。”王紹蘭《說文段注訂補》：“案京師為首，諸侯為手，四裔為足，所以為中國之人也。”王筠《說文句讀》：“言中國者，於夷曰東，於羌曰西，於蠻及焦僂曰南，於閩曰東南，於貉曰北，皆據中國以指斥之。”按以上所引《說文》和段、王、王三家的注解，都以為中國處于四夷的中部而得名，乃是重中輕外的傳統積習。其實自商代以迄西周，中國與四夷還沒有完全對稱。自東周以來，才以南蠻、北狄、東夷、西羌相對為言。

乙，¹甲骨文稱：“東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粹九〇七）這是就占卜東土南土西土北土的年穀成熟言之。此外，甲骨文言祭四方者屢見。總之，甲骨文之言東南西北四土以及四方，均就以“大邑商”為中心言之（甲骨文稱“天邑商”，是指穀熟，也即南亳）。《尚書》中也有東土、

西土之稱，例如：《康誥》：“肆女小子封在茲東土。”《酒誥》：“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又保卣的“王令保及殷東或（國，下同）五侯”，班簋的“三年靜東或”，宗周鐘的“南或及子敢陷處我土”，以上所列引的東土、西土和東或、南或均指遠處的方國言之。因此可知，甲骨文之言四土和四方，均以大邑商為中心言之，西周時代才進一步以中土（見下文）與四外方國對稱。

丙，典籍中有關用土圭測日景（影，下同）以定土中的作法，《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深訓縱，指南北為言），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風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為然。”孫詒讓《周禮正義》：“陽城縣，《續漢書·郡國志》屬豫州潁川郡，今在河南陽城府登封縣東南三十五里。漢時陽城，夏至以八尺表測景，適一尺五寸，無贏舛，先鄭蓋據目驗之，《開元占經·占日》引《晉太康地記》云，河南陽城縣，是為土中，夏至景尺有五寸，所以為候也，即先鄭說。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云，河南府告城縣測景臺，在縣城西北隅，高一丈。開元十年，詔太史監南宮觀立石表焉。唐之告城，即漢陽城地也。”按《水經注》：“潁水經其縣（陽城）故城南。……亦周公以土圭測日景處。”用土圭測日景，以定地中，詳前中央研究院《周公測景臺調查報告》。在上述之外，《書·召誥》：“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

其作大邑，其有時（是）配皇天。”偽孔傳：“稱周公言其為大邑於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為治。”《逸周書·作雒》：“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漢書·地理志》：“昔周公營雒邑，以為在于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說苑·至公》：“南宮遷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近百姓，敢無中土乎？”按以上各家所說的土中，《說苑》作“中土”，《周禮·大司徒》作“地中”。土與地同義。詞有倒正，故土中即中土。這種稱謂，是由于用土圭測量日光照射于地上的景子的距離尺度，以判定其中心所在，因而稱之為土中或中土。至于成王遷都洛邑，洛邑接近陽城，故稱之為土中，引而伸之，這也是後世稱河南地區為中州或中原的由來。但測景臺的效能，當然有它的局限性，如果以陽城為天下或世界的中心，顯然是不能成立的。

古代的中國也稱作華夏。《國語·魯語》：“以摠榮為國華。”韋注：“華，榮華也。”《書·堯典》：“蠻夷猾夏。”偽傳：“夏，華夏也。”《爾雅·釋詁》：“夏，大也。”《荀子·儒效》：“居夏而夏。”楊注：“夏，中夏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左傳》定十年：“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孔疏：“中國有禮義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故謂之華。”偽古文《尚書·武成》：“華夏蠻貊。”偽孔傳：“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上述的華夏和中夏也見于漢以後的典籍，不煩備舉。至于中國也稱作中華則不見于先秦典籍。《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注：“若使〔諸葛亮〕游步中華，騁其龍文，豈夫多士所

能沈翳哉。”這就是中華稱名的起源。

三 中與國二字本來的形音義如何解釋？

中與國尤其國字本來的形音義是極為複雜的一個問題。古文字中間之中作𠂔，伯仲之仲作𠂔，二字判然有別。𠂔字，商代甲骨文作𠂔𠂔𠂔𠂔𠂔等形，商代金文作𠂔𠂔𠂔𠂔𠂔等形，周代金文作𠂔𠂔𠂔𠂔𠂔等形，𠂔字均象有旒之旂。商代甲骨文每有“王立𠂔，亡（無）𠂔（風）”之貞，是以𠂔為有旒旂幟的佐證。由于旂旒較慢，不利于風之飄蕩，故以“無風”為占。商王有事，時常立𠂔以招集士眾（士謂“士卒”，眾謂“眾人”）而命令之。《說文》訓旂為“旗，有眾鈴以令眾也”，訓旃為“所以旌表士眾”，訓旗為“所以進士眾”。甲骨文無旂字，周代金文有旂無旗，借旂為祈。旗、旃、旗等乃後起字。又甲骨文稱：“王𠂔（作）王自（師）右𠂔左。”（粹五九七）這是借𠂔為眾間之𠂔的由來。又商代金文的旅字常見，例如：



以上所列，均為旅之初文，甲骨文和周代金文均省作𠂔或𠂔形。《金文編》把一些省體的旅字，均誤列于𠂔字之上。其實，𠂔从子，與旅字迥別，以上所列商代金文的幾個旅字，上部象旂竿頂，

頂下或左或右帶有旂旒。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旅的中部或下部，象三人、二人或一人以手扶持旂竿中部口形的兩側（其中第二行下兩個旅字均省去口形）。由此可見，卓字中部之所以从口，是作為左右把手而設。這就證明了商人的立中是用人以扶持其左右，並非只將旂竿插入地中。

中國之國，周代金文早期作或，後期孳乳為國，又古文字的或、國、邑三個字的構形有着密切的聯系，故《說文》既訓或與國為邦，又訓邑為國。但自來對於或、國、邑三個字的解說分歧，令人無所適從。現在將或、國、邑三个字論證于下：

商代甲骨文沒有或、國二字。甲骨文人名“沚𠂔”之“𠂔”，从戈从口，舊誤釋為國。《說文》：“或，邦也，从口（音囗）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域，或又从土。”《說文繫傳》：“國，邦也，从口或聲。”段注：“古或、國同用。”按《說文》訓或為“从戈以守一”，自來《說文》學家和近年來古文字學家多無異議。其實，許說完全出于臆測，殊不足據。今將周代金文的或與从或之字以及國字，分為前後期擇錄于下：

(一)，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二)，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以上是前期金文的或與國字

(三)， 𠂔 (滅) 𠂔 (職) 𠂔 (職) 𠂔 (職)

以上是前期金文中兩人从或的字

(四),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以上是後期金文的或與國字

以上所列，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第(一)類的或字和國字所从的或字左旁作回、口、亘等形，右旁均从戈。第(二)類和第(三)類所从的或字作𠄎、𠄎、𠄎等形，和第(一)類基本相同。第四類的或和國(國)字所从的或，其右側均从戈。依據上述，如果說武字从戈為戈之省文，那麼，為什麼金文前期的武字沒有一個从戈的例子呢？為什麼金文後期又由从戈變為从戈呢？這兩個問題是由于或字左側从亘與从口之不同而造成的。我認為，第(四)類的或字和國字之从或，是把第(一)、(二)、(三)三類或字左側亘形上部的橫劃向右延長，以為戈字中部的橫劃，並非戈字另外加一橫劃才變成戈形，是顯而易見的。

《說文》：“邑，國也，从口（音國），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从卩（音節）。”按卩本作𠄎，象人跪形（詳羅振玉《增訂殷虛書契考釋》卷中頁七）。《左傳》桓十一年：“以禦四國，”杜注：“邑亦國也。”又莊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按甲骨文屢見“大邑商”之稱，商代乃“城邦制”，故以“大邑商”代表商國。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古國字从戈乎口，象城有外垣。”按吳氏城垣之說頗有見地，但仍誤從《說文》“从戈”之說，又不知亘為古文邑字的省體。陳夢家謂：“東或之或从戈从回，西周金文則从亘，是其省形。卜

辭亦有囟字（林二·二十六。按囟字中間不作正方形，又無上橫，上下文也殘缺，陳說待考）象邑外四界之形。”（《西周銅器斷代·保卣》，《考古學報》第九冊）按陳說甚是，但邑字為什麼又孳乳為从卩？保卣貳字，右旁為什麼从戈？戈字後來又為什麼變為从戈？左旁从囟，後來為什麼變為邑。這不僅為陳氏所不解，也是自來懸而未決的疑難問題，其實，甲骨文的邑字有的作（後上七·一三），下部从卩，與囟形相連，遂省去橫劃。但商器邑爵的邑字作，旦形下部有一橫劃，而左、右、上又省去了兩豎一橫。這就證明了形確為邑字的初文。師寰簋以鄰為國，鄰也通域。《說文》以域為或之重文，邦國必有疆域，故域與或通。後世由于用各有當，遂致分化。又吳大澂《說文古籍補》引大畧戈的或字作。按此字上从戈，乃戈之形譌。下从邑，不僅可以看出是由向等形演化而來，同時也是或字从口為邑的一個有力佐證。

邑字上部所从的口形，乃方圓之方的初文。古文字常見的衛字，中部从韋，而韋字从口與从方互作（詳楊樹達《積微居甲文說》二六頁），是其證。囟字為邑之初文，从口从，乃會意字。其从口，是借用古文方字，以表示城邑四面有垣牆之形，其从，既有別于口（方），也表示都邑以外的四郊。《爾雅·釋地》：“邑外謂之郊，”由囟字演化為為，又省作，隸字則作邑。至于邑字从，象人跪于邑前以致祭。古文字的邑字多作，上下多不相連。甲骨文常見祭邑之貞，例如：

（一），貞，叀出邑（乙四五三九）。

（二），貞，我叀自茲邑，若（戠三七·十三）。

(三)，頁，出于西邑（林一·九·十四）。

(四)，頁，求于西邑（綴十八）。

以上所列四條的邑字均作頁，既是祭邑之證，也是邑字从頁的由來。

或字本作𡗗，應隸定作𡗗。如以《說文》為例，則應釋為：“𡗗，國也，从𡗗，古文邑，戈聲。國，或（訓亦）从口，或聲。”據此，則𡗗本為从𡗗戈聲的形聲字。至于戈與或的音讀也需要加以說明。就聲母言之，則戈、或、國三字只是深淺喉之別。就韻部言之，黃侃分古韻為二十八部，其中分“之部”為咍、德兩部。戈、或、國三字均屬德部，又同屬入聲。所以國字初文之作𡗗，其从戈聲是可以肯定的。

四 總結

綜上所述，則中國這一偉大的名稱，以周初何尊銘文和《書·梓材》相驗證，其起源于武王時期是有疑問的。又典籍中的中國，還有華夏、中夏、中華等不同的名稱。至于就古文字來說，中國之中本應作𡗗。甲骨文的𡗗字本象有旂之旂，商王有事，立𡗗以招集士衆，士衆圍繞在旂之周圍以聽命，故𡗗字又引伸為中間之𡗗。甲骨文的“王作三師右𡗗左”，已用𡗗字為中間之𡗗。這就是中國之𡗗字本應作𡗗的由來。再就國字來說，《說文》訓國為从口（音囙），也訓或與國為邦，尚無不通。但是，後訓或為从口（也音囙），又訓或為“从戈以守一”，則支離舛錯，臆測無據。古文字以𡗗為國之初文，其从𡗗，乃邑之初文，由𡗗孳乳為𡗗為𡗗，

又省作畀。但其初文作，足以證明𡗗字左旁之从古文邑是可以肯定的。𡗗乃从弋聲的形聲字，後來𡗗字省化作𡗗，最後譌變為𡗗，𡗗和國。這就是中國的國字發生發展和演變的源流。

論“古史辨派”

楊 向 奎

一、前 言

從一九二六年《古史辨》第一冊結集出版到一九四一年《古史辨》第七冊結集出版，先後共十五年的光景，參加中國古代史討論者有多人，而主將始終是顧頡剛先生。後期，《古史辨》第七冊的主編是童書業教授，他是頡剛先生古史學說的發揮者。筆者在大學讀書時從頡剛先生學，選讀他的“尚書研究”，喜今文家言，也參加古史討論，但在參加辨論的過程中，又懷疑今文家言，對於康有為學風之粗枝大葉有所不滿，所謂劉歆編偽《左傳》、《周禮》之說，不過是又一次的“託古改制”而已，於是以當時的大部時間研究《左傳》、《周禮》，力圖為劉歆翻案而說明兩書之不偽，如果兩書不偽，則“古史辨派”的理論根據在許多方面將發生動搖，於是在古史系統上與頡剛先生的看法不同，而與童書業教授“同室操戈”矣。在《古史辨》上還可以看到童疑與楊守互相辨論的文章；疑即疑傳統的古史系統，守即守虞夏商周以來的古史系統，而童疑即童書業教授，楊守即筆者本人。雖然對於古史的看法不同，但對顧先生學術之淵博，文筆之流暢，素所敬仰，非敢如康成之於何劭公“入室操戈”也。

事隔三十餘年，所論都為往事，後來顧、童兩先生都是歷史唯物主義者，又作出許多寶貴的業績，此篇所論只是就《古史辨》而論